

日美同盟变局：表现与趋向

吕耀东^{*}

【内容提要】 日美同盟因为各自利益得以维持，但却因各自利益诉求不同而横生变局。60年前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显然不适应时过境迁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格局变动，日美同盟内部结构性调整体现出双方不同的政策诉求。美方要求日方多出钱、多出力的要求，正是日方谋求日美同盟对等性的充分理由。日美同盟连带的日美经贸问题、日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问题，以及日本对于美伊关系的政策变化，预示着日美同盟内部的结构变化在所难免。日美同盟对等性的问题成为日美双方无法回避的议题。未来日美同盟的结构性变局，不仅深刻影响日美双边关系，也将是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的重大变故。

【关键词】 日美同盟 经济外交 大国关系 中东外交

^{*}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 60 周年之际，双边关系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很大变化。尽管日本首相安倍强调《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守护亚洲、印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的保障和支柱。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随着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及新问题的出现，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是至关重要的，期待日本在安保方面作出更多贡献。可见双方对基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同盟体制的认知已今非昔比，体现在外交政策层面的政治诉求也不尽相同。本文就日美同盟变局的政策表现及发展走向进行探讨。

一、日美同盟内部利益诉求的变化及取向

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关系的核心和基轴。美国也将日本作为其落实亚洲战略利益的主要盟友。近年来，如何应对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对于日本的冲击，借机谋求同盟体系的“对等性”，是安倍发展日美关系的重点。在美方看来，日方利用双边同盟机制获得利益和好处的同时，却未作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在安保层面作出更多的贡献。不过，美日双方均认识到维持双边同盟机制的现实意义。如果说安倍在日美双边贸易谈判上有所“让步”，也是为了在维护日美关系的前提下，巩固日美同盟的政治基础和现实利益，强调应该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的“互助”关系。正如安倍在 2019 年初国会施政演说中所言：“如今日美同盟无比牢固，前所未有的。在彼此深厚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在保持威慑力的同时，我们要切实减轻冲绳基地的负担。”^①推动美军基地从“普天间机场”搬迁至边野古的工作。也就是说，日本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维护既定政治与安全主导权的同时，通过外交努力渐进谋求同盟体系的对等性乃至主体性。

首先，日美领导人均认识到寻求“现实利益共识”对于强化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日美同盟毕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加之美国将日本从一个敌对的战败国一举提升为同盟国，对于日本从被占领到加入美国建立的西方国际体系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也是日本历届政府均将日美同盟关系作为外交基

^① 平成 31 年 1 月 28 日第百九十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90128siseihousin.html。

轴的根本原因。为了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生命力，日美两国在冷战后积极为双边同盟机制注入新的活力，将日美同盟的针对性从苏联转向维护所谓东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竭力渲染“中国威胁论”。近年来，日美两国求大同存小异，不断为日美同盟的存在和维持寻找现实理由。安倍从2019年4月访美开始频繁与特朗普进行首脑会谈，反映出日美之间出现的驻日美军搬迁、双边贸易谈判等一系列问题亟须解决。安倍为了表达日美关系的重要性，特意安排美国总统成为令和时代首位访日的外国元首。美方也就特朗普总统作为国宾访日一事表示，此次访问是向国际社会显示“前所未有的强大日美同盟”，实现首位会晤日本天皇才是美国总统“此访的核心”。^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下旬访问了日本，称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繁荣的基石。安倍在举行首脑会谈后表示，希望在令和时代日美同盟变得“纽带依然坚固”和不可动摇。他有意向国内外彰显日美首脑间的信赖关系和牢固的日美同盟关系。通过本次日美首脑会谈，日本阐明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础，以共同价值观为纽带主导亚太地区事务战略方针。安倍还陪同特朗普一同搭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加贺号准航母，以展示牢固的日美同盟关系。日本政府在2018年底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備计划》中决定，要将加贺号与同型号舰出云号改装为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可短距离起飞和垂直降落从美国采购的42架F-35B尖端隐形战机，为特朗普政府所呼吁的“购买美国货”作出了贡献。事实上，早在2017年5月出云号就首次实施过基于安全保障相关法的对“美舰防护”任务。加贺号与出云号被视为“自卫队与美军一体化的象征”。对此，特朗普在美海军横须贺基地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上发表演讲称，“日美同盟空前牢固”，表明所谓“凭借力量实现和平”确立地区稳定的姿态。他还提到日本采购105架隐形战机F-35的计划，称赞其“在同盟国中数量最多”^②。显然，安倍对于特朗普“赞许”的弦外之音是十分明了的，深知维持日美同盟关系需要“必要”的付出。但是，目前日本清醒地认识到，日美同盟仍然是日本安全战略的支柱，因而要依托日美同盟，不断提高日本在

^① 《美高官称特朗普访日目的不在贸易》，共同社，2019年5月23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5/276da2cd5319.html>。

^② 《特朗普称日美同盟空前牢固》，共同社，2019年5月28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5/4e046eca4f3f-f35.html>。

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日美同盟机制的“非对等性”难以化解日美关系中的“现实问题”。日美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同盟关系，结构性的不平等既有历史性的原因，亦有现实问题。战后以来的日本从不习惯因战败被美国压制，到习惯被美国安全保护而得到经济迅速起飞的红利。这使得美国必须通过收取安全“保护费”得以维持双边同盟的心理平衡，并维护和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存在感。但日本和韩国对于美国逐年提高安全“保护费”的做法大为不满，表现出过去少有的所谓对美“离心力”倾向，究其根本原因是，日本和韩国对于与美国的“非对等性”同盟机制日益反感，抵制情绪逐步演化为对美的“历史反动”。对此美国一直予以高度警惕，常常要求日本和韩国尽同盟国的责任和义务，要多出钱出力。一直以来，美方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太地区同盟国接受“相应的负担”，继续迫使日本增加美军驻留费负担以及购入最尖端美制武器。在2019年大阪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举行前夕，特朗普突然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发难。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电视台电话采访时称，“若日本受到攻击，美国必须保护日本，而美国受到攻击时，日本没有必要帮助我们”，批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防卫义务是单方面的。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回应称：“日美双方的义务保持平衡，单方面的指责并不恰当。日美间不存在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说法。”^①美日矛盾的言论一出，国际社会一片哗然，日方马上进行外交公关，实施紧急“扑火”。安倍在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日美两国首脑近年来高密度的接触，本身就是日美同盟强化的证据，安倍在日美首脑会谈上并没有就特朗普有关退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发言寻求解释，回避不利于日美关系的相关话题，此举可能是顾及避免对日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在安倍看来，日美同盟是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最重要依托，即使在双边贸易谈判中适当让步，也要维持日美同盟的平稳发展。

另外，日美同盟在维护所谓“东亚和平稳定”的同时，力图推进“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构建在日美同盟基础上的、由美日澳印组成的“民主国家”安全

^① 《特朗普不满日美安保条约称美承担单方面防卫义务》，共同社，2019年6月27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6/97ccea2f873.html>。

联盟，打着维护“航行自由”和“法治”的幌子，谋求日美同盟的全球化。

二、日美在经贸层面的分歧与博弈

日美在 2018 年 9 月的首脑会谈上决定启动关税谈判，双边部长级磋商于 2019 年 4 月开始，8 月双方达成框架协议，9 月签订贸易协定。日美贸易协定只用短短一年时间就达成妥协，表明日本安全保障仍然依赖美国的政治困局。日本曾设想的战略手段是，利用在农产品出口上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参加国相比处于劣势的美国的焦躁情绪迫使其让步，但却被软硬兼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操控，未能取得预期成果。

首先，日美贸易谈判凸显两国经济利益分歧。鉴于美国已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生效，美国农户无法享受日本市场的关税下调之惠，处于不利的竞争环境。因为退出 TPP 使得美国在对日农产品出口中与竞争对手澳大利亚及加拿大等国相比处于劣势。美国政府一直强烈要求日方就下调或撤销农产品关税等问题尽快谈妥，尽快扭转牛肉、猪肉等出口的不利影响。并且明确表示不受日方视为谈判基础的 TPP 的“束缚”，不会在农业和汽车领域对日让步。日方认为，全球向美国经济作出最大贡献的就是日本企业，且日本企业的对美投资持续增加，要求美方认识到日本作为盟友的“诚意”。日本从日美双边贸易谈判伊始，就把美国农产品关税削减至以 TPP 水平为限设成了谈判防线。此外还力争实现美国在退出 TPP 前承诺的取消日本汽车关税的相关条款。特朗普政府仍在强调日本部分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对美国造成的影响，并且始终都没有放弃汽车关税这一“武器”。一直以来，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谈判难以一帆风顺，农业和汽车关税问题常常是谈判争论的焦点及关键难点。可以说，日美双方展示出的强势姿态，显示出同盟国内部的经济利益纠纷与分歧。

其次，日美贸易谈判虽然达成妥协，但日美贸易协定掩盖不了两国的经济利益冲突。2019 年 9 月 25 日，特朗普和安倍晋三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签订初步贸易协定，取消或降低一些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关税，但美日贸易谈判的焦点——汽车关税——并未囊括在本协定中。在特朗普看来，如果美中贸易谈判

长期化、经济情况恶化，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就有可能败给民主党候选人，若与日本的双边贸易谈判取得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成果，那么在国内政治上是有利的。因此特朗普决定不对日本汽车加征关税，将代之以要求采取汽车出口限制措施。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按照美方要求同意开放农副产品市场。按照协定，日本将降低牛肉、猪肉、奶酪、葡萄酒等输日美国产品关税，取消杏仁、蓝莓和甜玉米等农副产品关税。日本对美出口方面，空调零部件、燃料电池和眼镜等产品关税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取消。日美贸易新协定局部缓解了美国农产品出口压力。但日本农户因低价美国农副产品的流入而面临更加严酷的市场竞争，日本国内农业将面临严峻考验。日美 2018 年 9 月同意启动双边贸易谈判之初，日方坚持以往在 TPP 约定税率范围内与美国谈判。但《日美贸易协定》显示，日本对美国农产品减免关税税率没有超过日本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其他签署国提供的关税减免力度。另外，日本各界更关注的是日本输美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关税减免问题。因为美国曾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承诺全面取消对日本产汽车等工业制品的关税，但本次《日美贸易协定》对日本产汽车和相关零部件的关税暂不取消，显然日本对美作出明显让步，双边经贸分歧未能消除。

再次，日美双边经贸摩擦涉及货物、投资和服务贸易等更广领域，未来美方将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和投资领域，逼迫日本进一步让步。美日经贸摩擦由来已久，美方表示将在下一轮美日经贸谈判中解决进口汽车关税问题，日方将寻求完全免除汽车和零部件关税，预计获美方同意的可能性不大。^①值得关注的是，未来美方将进一步扩大对日磋商对象范围，除农产品和工业制品关税外，还包括汇率、知识产权、金融、投资等共计 22 个项目。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与日本之间仍存在关键性的分歧。可以预见，日本还需直接处理与美国之间更大范围的贸易问题的分歧和矛盾，而这一过程注定是充满困难与挑战的。如果日美经贸摩擦加剧，将会对双边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① 《日美谈判中汽车关税撤销承诺悬空》，共同社，2019 年 12 月 5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12/4c389ba280f7-.html>。

此外，在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大变局”层面，日本积极开展全方位经济外交，积极拓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布局。在签署日欧《经济合作协定》（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协议的基础上，主办日非国际会议，开展日美双边经贸谈判、出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和中日韩三国成都峰会，推动中东能源外交并着手自卫队派兵，充分展现了安倍持续应对“美国优先”的全球性“经济外交”的政策意向。

三、日美同盟关系中的日俄领土问题变数

从历史的纵向来，美日同盟是在冷战时期两极格局形成的时代产物，其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性质一直延续至今。当然，从针对冷战时期的苏联到冷战后的俄罗斯，日美同盟政治军事的针对性和指向性始终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说美日同盟不针对“第三方”的俄罗斯显然不符合国家政治的客观实际和现实状况，日俄两国的领土问题由来已久，因此日美同盟关系在日俄领土问题上的变数显然不能忽视。

首先，日俄领土问题看似由于双方利益诉求相异，实则日美同盟的不利影响脱不了干系。1956年苏联和日本签订的《日苏共同宣言》，宣布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根据《日苏共同宣言》第9条规定，苏日将继续就缔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在和平条约缔结后苏联将把齿舞岛、色丹岛移交日本。但随着日美同盟关系的形成，东北亚安全环境日趋紧张。苏联政府得知在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改后通告日方称，要落实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中关于“移交齿舞岛和色丹岛”事宜，前提条件是“所有外国军队从日本领土撤离”。日本政府当时反驳称，无法接受单方面变更1956年宣言内容的做法。此后日本亦要求苏联将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全部归还”，导致日苏一直未能签订和平条约，直至冷战后继承苏联地位的俄罗斯仍未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2018年12月，俄罗斯外交部宣称，1960年苏联政府向日本提出以“让美军撤出日本领土”作为移交齿舞岛、色丹岛条件的《对日备忘录》，要再次成为日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的内容。俄方还可能就日俄和平条约谈判提出两项现实关切事项：（1）北方领土移交给日本后，美军部署的可能性；（2）日本欲从美

国引进并部署陆基导弹拦截系统——“陆基宙斯盾系统”——的可能性。^①可见，俄方提出日美安保体制和驻日美军问题，意在対日美同盟针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牵制。尤其是在近期美俄关系恶化的形势下，俄方强调移交两岛存在安全方面的担忧，其试图动摇日美同盟的发言引人注目。俄方考虑到日本力争引进美制陆上部署型导弹拦截系统“陆基宙斯盾系统”的动机，表现出对美国导弹防御网在日本设置据点的高度关切。日本政府也一直存在悲观论调，认为普京同意移交主张为“本国领土”的岛屿的可能性较低。俄方对于美军在归还后的岛屿上驻留这一情形的警惕感也根深蒂固。若缔结条约，领土问题就被搁置的担忧无法消除。^②显然，日美同盟再次成为影响日俄和平条约谈判进程的外部因素之一。

其次，日美同盟已经成为日俄缔结和平条约的现实障碍。虽然俄方同意按照《日苏共同宣言》有关“先条约后交两岛”的原则进行谈判，但要就齿舞、色丹两岛移交的性质进行谈判和“细致商讨”，依然要求日方承认和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战后安排”。在俄方看来，美国依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日本长期驻军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战后安排”，因而日方应该像续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认可驻日美军长期驻守日本本土一样，“对等”看待俄罗斯领有“南千岛群岛”的历史客观性和现实性。对于和美国敌对的俄罗斯而言，“南千岛群岛”的战略价值很高。俄方担忧若把该群岛交给与美国处于同盟关系的日本，美国将会把军事触角延展到“南千岛群岛”，导致俄方对美威慑力会减弱。2019年9月，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公开指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美军可以在日本任何地方设置军事设施，这成为日俄缔结和平条约的障碍。但他说：“普京总统有着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坚定的政治意志。”强调日本对俄罗斯而言是“重要且伟大的邻国”，缔结条约“符合我们的利益”。^③以此表明日美同盟关系不仅影响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国家安全，也是日俄缔结和

① 《俄方就和平条约谈判称驻日美军撤退要求亦为磋商对象》，共同社，2018年12月4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12/51d2ba762afe.html>。

② 《安倍就对俄谈判展现信心，普京发言解读不同》，共同社，2018年11月5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11/8ea08364c077-.html>。

③ 《俄总统发言人称目前不可能向日本移交岛屿》，共同社，2019年9月25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9/3c4f583fdc56.html>。

平条约的最大障碍。况且俄罗斯一直警惕日美强化军事一体化的动机，尽管安倍曾向普京解释驻日美军“与俄罗斯并非敌对”，但仍难以化解俄方的质疑。

事实表明，日美同盟已成为影响日俄缔结和平条约谈判启动的不利因素。纵观日俄关系的发展历程，每当两国关系出现缓和发展，美国作为外部因素就会成为妨碍日俄缔结和平条约的“绊脚石”。这就让日方怀疑日美同盟究竟能够维护多少日本的国家利益。可以预见，日俄在和平条约谈判与处理领土问题的矛盾难以化解的时候，日美同盟终将成为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四、日本谋求日美同盟对等性的“中东平衡外交”

尽管日美均强调双边同盟关系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不对等的日美同盟机制一直影响着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安倍为了“借船出海”的大局，强调《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重要性的同时，特朗普却要求日方为日美同盟“多作贡献”，对日本长期依靠美国军事保护而付出较少表示不满。日本借此表达要为盟友美国出力，就“伊核问题”充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调停人”或“斡旋者”，力求改变日美同盟的非对等性，大有游离于日美同盟框架之外，开展发挥自身主体性的“中东平衡外交”。安倍首相在2019年初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长期以来，我国与中东地区各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此历史基础上，为维护中东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将以自身独特的角度积极开展外交工作。”^①他强调日本基于能源的需求，必须和中东相关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这是日本经济外交不可动摇的方针。有时甚至出现游离于盟主美国中东外交政策之外的现象。事实上，历届日本内阁是这样想的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但安倍不同以往的做法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手段拉近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国际政治考量如下。

首先，安倍意在发挥与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关系深厚的日本独特性，扮演美伊争端的调停人角色。由于中东地区局势在美伊两国持续角力下高度紧张，

^① 平成31年1月28日第百九十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90128siseihousin.html。

引发国际社会密切关注。日本力争借助与美伊双方的良好关系促进中东局势的稳定,通过协调因伊核协议及经济制裁对立的美伊关系,来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正如官房长官菅义伟对外所言:“我国愿利用与伊朗的传统友好关系,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贡献。希望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问题。”^①接着安倍首相以“调停人”的角色于2019年6月12日到14日首次访问伊朗,向中东展示“日本特有的和平外交”姿态。安倍首相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时表示,希望美伊缓和核问题对立僵局,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而哈梅内伊表示无法相信美方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拒绝了与美方的对话。这也意味着日本在美伊冲突中的调解尝试并不成功。即便安倍访问伊朗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果,也是日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表现。

其次,中东国际环境的好坏,事关日本的国家利益,对美国和伊朗开展“平衡外交”收益更高。中东地区局势事关国际能源市场稳定、日美同盟关系、航运安全、国际核军控形势等多项与日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安倍势必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机遇增强其地区影响力,进而维护、扩展日本利益。就能源安全为例,日本既是初级能源消耗量位列世界第五的主要能源消费国,也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能源进口大国。这就决定了能源安全在日本国家安全中具有突出地位,而中东地区一直以来就是日本石油的主要来源地。日本《2019年能源白皮书》显示,其99.7%的原油依靠海外进口,其中87.3%来自中东地区。正因为如此,包括安倍内阁在内的历届日本政府对提升自身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均给予高度重视。确保能源来源稳定及运输安全是日本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保障的关键环节,而中东地区形势的持续恶化无疑触碰了日本在能源安全方面的“敏感神经”。面对美伊关系对立的中东局势,日本政府一改以获取石油供应为目标的能源外交局限,突破日美同盟的一贯思维,以“调停人”的角色在同盟国美国和伊朗之间开展“平衡外交”。安倍这样的行为是尝试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由,发挥日本主动性外交,积极参与中东国际事务的重大突破。

^① 《安倍欲扮演美伊调停人角色》,共同社,2019年5月24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5/db834d8321ff.html>。

最后，安倍出访中东为派遣自卫队“打前站”，开展突破日美同盟机制的政治试探。2020年1月，安倍首相在几经周折后开启了新年首访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在内的中东三国之旅。就在安倍启程出访中东三国之前，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已向海上自卫队下达了开赴中东的命令。日本陆续向中东派遣包括260名士兵、多架P-3C巡逻机及“高波号”护卫舰在内的海上武装力量。回顾日本政府派遣自卫队赴中东地区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日本力求在中东地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试图脱离日美同盟框架独自扩大海外派兵规模，为修改“和平宪法”铺路。早在2019年7月，美国提出了在中东海域针对伊朗组建“护航联盟”的计划邀请盟国参加。日本担心参与其中有损同伊朗的关系，会波及其中东能源安全，决定不参加美国主导的旨在针对中东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意愿联盟”，采取单独派兵中东开展活动。日本政府在2019年底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向中东派遣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和巡逻机。派遣目的是鉴于中东局势恶化，为确保日本相关船舶安全开展情报收集，并与各国共享。^①还将自卫队的活动区域限定在远离伊朗的阿曼湾、阿拉伯海北部和曼德海峡东侧。日本政府这种两不得罪的做法既可缓解来自盟友美国的压力，也可维护通过高层互访有所进展的日伊关系，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日美同盟框架之外日本自卫队海外派遣常态化的目的。

五、结 语

总体上，日美同盟不仅是日本外交及其对外关系的基轴，也是美国维护其亚太地区政治军事霸权的主要权力机制。日本一贯借助日美同盟机制海外派兵，从协助美军海外动武到自卫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逐步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进而达到修宪目的，为在国际上宣传历史修正主义创造条件。美国出于维护在亚太地区的既得利益，巩固和扩大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全球战略利益，不断强化日美军事一体化程度，充分利用日本“借船出海”的意图，

^① 《安倍内阁决定向中东派遣自卫队》，共同社，2019年12月27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12/aeddbf1cc5b8.html>。

要求日方为日美同盟“多作贡献”，为驻日美军的对日“保护伞”多出钱。日美同盟因为各自利益得以维持，但却因各自利益诉求不同而横生变局。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已经签署 60 周年，时过境迁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格局变动，成为日方要求日美同盟对等性的现实理由，而且迫切以“自主外交”加以突破。正如安倍晋三在 2019 年初国会施政演说中所言：“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日本外交应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解决全球规模问题上，各国强烈期待日本能发挥引领作用。”日本外交自主性要求日美同盟对等性的问题成为日美关系无法回避的议题。在日美经贸问题上，双方无法回避“美国优先”与维护日本经济利益的分歧，尽管达成双边贸易协定，但双方的经济利益冲突并未化解。在大国关系问题上，日美同盟显然已经成为影响日俄解决领土问题和缔结和平条约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日本由依托日美同盟海外派兵，走向在日美同盟框架外单独派兵中东的“平衡外交”，力求以美伊关系调停人的角色定位日本自主外交的国际形象。

可以预见，随着美国相对实力下降，日美同盟内部的结构变化在所难免，美方要求日方多出钱、多出力的要求，正是日方谋求日美同盟对等性的充分理由。而美国要求日本为同盟机制运行投入更加助长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自主性，让美国难以控制的日本修宪在未来可能成为现实。这就必然会冲击日美同盟的历史基础，日方要求驻日美军逐步迁出冲绳，就是日本力求改变“战后体制”的现实表现。安倍竭力缓和日俄关系、平衡美伊关系、推动“印太战略”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无不是针对美国的自主性外交，大有谋求日美同盟体系内部主体性的战略取向。未来日美同盟的结构变局，不仅深刻影响日美双边关系，也将是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的重大变故。

The Manifestation and Tendency of the Changing Situation of the Japan-U.S. Alliance

..... *Lu Yaodong*

[Abstract] The alliance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been maintained due to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but changed dramatically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interest demands. The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from 60 years ago is apparently not adapted to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pattern,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reflect the different policy demands between the Japan-U.S. alliance. The United States demanding for more money and efforts is a sufficient reason for Japan to seek equality in their alliance. The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gotiation of Japan-Russia peace treaty and the change of the policy towards the U. S. — Iran relationship, indicating that the structural changes within the alliance are inevitable. The issue of equivalence in the Japan-U.S. alliance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issue for both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future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Japan-U.S. alliance will not only profoundly affect Japan-U.S. relations, but will also be a major chang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Key Words] Japan-U.S. Alliance Economic Diplomacy Great Power Relations Middle East Diplomacy

U. S. — India Relationship: A Sele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 *Zhang Jiadong Wei Han*

[Abstract] Strategic partnership is a kind of transitional form from ordinary relationships to alliance. Relevant countries bonded with such exclusive partnership tend to cooperate closely in certain areas, but are not legally binding.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been involved in a heat wave of establishing partnerships, in which many countries have built different forms of partnerships includ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s. From